

农民城镇化意愿与响应能力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贵州 1796 名农民的调研数据

殷红敏^a, 班永飞^{b*}

(安顺学院 a.马列部; b.教育管理系, 贵州 安顺 561000)

摘要: 基于贵州省 1796 名农民城镇化意愿及响应能力的研究表明: 大多数农民支持或响应城镇化建设。影响农民城镇化意愿的正向因素主要为子女教育改善、自身发展、交通便利、个人生活质量改观、收入提高。影响农民城镇化意愿的负向因素主要是城市消费水平高, 生活成本增加; 无力解决住房问题; 就业难; 治安不好, 污染较严重; 难以享受基本的保障。此外, 性格、情绪稳定性、人际关系、亲密关系和依赖关系等心理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农民的城镇化意愿。因此, 应通过推行社会保障制度, 改善其子女教育现状, 丰富进城农民业余文化生活, 提高进城农民心理健康水平等措施, 消除农民对城镇化的担忧, 尊重农民意愿, 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

关键词: 农村城镇化; 农民; 意愿; 响应能力;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C913.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2)03-0044-05

Urbanization willingness and responsiveness of the farmer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1796 farmers in Guizhou

YIN Hong-min^a, BAN Yong-fei^{b*}

(a. Department of Marxism-Leninism; b.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Anshun University, Anshun 561000,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n the urbanization willingness and responsiveness of 1796 farmers in Guizhou province suggested that most of them support urbanization.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positive factors were: children education and farmers' self development getting better, transportation becoming convenient, living standard and income being promoted, while the negative factors lay in: consumption in cities being higher, housing and employment being difficult, social security and pollution being worse, and assurance baseline being difficult to get. In addition, personality, emotional,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nd dependencies would in certain degree affect farmers' urbanization willingness. Then this article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 to solve those problems.

Key words: urbanization; farmers; willingness; responsiveness; influencing factors

一、问题的提出

围绕城镇化建设中的农民问题, 近年来许多学者作了不少研究, 归纳起来主要包括: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利益得不到保障, 易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1-3] 快速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民增收, 但农民响应能力不高;^[4-5] 农民是否愿意进城与年龄、受教

育程度和经济水平等有关; 相当一部分农民“被城镇化”, 导致返贫。^[6-8] 上述研究从不同方面对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问题进行了论述, 证明城镇化对农民心理产生了巨大冲击, 一些消极的社会应对方式开始出现。然而, 迄今为止对农民城镇化的理解, 较多的还停留在政策话语的层面, 重在关注如何促进农民城镇化, 如何保障农民城镇化过程中的权益问题。对于农民如何理解城镇化, 是否愿意城镇化, 是否响应城镇化等问题缺乏实证研究和前瞻性的对策研究。

国外城镇化发展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 但也有

收稿日期: 2012-06-01

基金项目: 贵州省哲学社科规划资助项目(11GYB37)

作者简介: 殷红敏(1967—), 女, 贵州安顺人, 副教授。

*为通讯作者。

很多教训令人深思。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是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实现了城乡逐步一体化;拉美国家“过度城镇化”不仅没有给城市的健康发展注入活力,也没有给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新的生机,导致国内劳动力大量剩余,失业人口、贫困和绝对贫困人口较多,很多国家出现了“贫民窟”。中国的城镇化应该将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要考虑农民的意愿和实际能力。

基于此,本研究调查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农民的意愿以及农民城镇化的响应能力,可以协助政府提高城镇化建设决策的科学性,加快城镇化进程;有利于建立农民风险预警系统,防止城镇化将农民变为新的弱势群体,为政府管理社会风险提供依据。

二、农民城镇化意愿与响应能力

2011年5-8月,笔者分层随机抽取贵州省贵阳、安顺、遵义和六盘水等地农民,发放问卷2000份,回收问卷1852份,回收率92.6%,有效问卷1796份,有效率97.0%。有效问卷中,男性933人(51.9%),女性863人(48.1%);汉族1182人(65.9%),少数民族612人(34.1%);已婚1041人(58.0%),未婚755人(42.0%);未受过教育和小学438人(24.3%),初中611人(34.0%),高中或中专及以上747人(41.6%);县(市)区和县(市)郊区351人(19.5%),乡镇337人(18.8%),农村1108人(61.7%);具体人口学信息详见表1。

研究工具包括安全感量表、成人依恋量表、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9-11] 1)安全感量表。该表由丛中和安莉娟编制。这是一个自评量表,分为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2个因子,人际安全感主要反映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安全体验;确定控制感主要反映个体对于生活的预测和确定感、控制感。量表共16个项目,2个因子。记分方法为五级评分:A非常符合,B基本符合,C中性或不确定,D基本不符合,E非常不符合,分别记为1、2、3、4、5分,分数越高,安全感越高。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内部一致性信度0.796,

表1 调查农民人口学变量特征(n=1796)

	变量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933	51.9
	女	863	48.1
受教育水平	未受过教育	96	5.3
	小学	342	19.0
	初中	611	34.0
	高中或中专以上	747	41.6
有无宗教信仰	无	1607	89.5
	有	189	10.5
民族	汉族	1184	65.9
	少数民族	612	34.1
婚姻状况	未婚	755	42.0
	已婚	1041	58.0
目前居住地址	县(市)区	232	12.9
	县(市)郊区	119	6.6
	乡镇	337	18.8
	农村	1108	61.7
年龄	19岁及以下	245	13.6
	20-29岁	683	38.0
	30-39岁	338	18.8
	40-49岁	349	19.4
	50-59岁	107	6.0
	60岁及以上	74	4.1

重测信度为0.742。2)成人依恋量表。2003年由吴薇莉修订。该量表是一个自评量表,包括3个分量表,分别是亲近、依赖和焦虑分量表。每个分量表由6个条目组成,共18个条目,采用五点评分法,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分数越高,程度越高。经施测检验,问卷具有较好的信效度。三个分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亲近0.7187,依赖0.6202,焦虑0.7848,重测信度为焦虑分量表0.193,亲近和依赖分量表均为0.741。3)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英国心理学家Eysenck编制)。简表由钱铭怡于2000年修订,包括神经质(N)、内外向性(E)、精神质(P)3个人格维度以及一个掩饰性分量表(L),48个条目,4个分量表。量表采用两级评分,“是”和“否”,各分量表的得分为该量表内所有题项的平均分,范围在0-12之间。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P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0,N、E、L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均大于0.70,且重测信度在0.67~0.88之间,问卷

稳定性高。

施测程序及数据处理。考虑到语言和文化因素,调研人员由家住农村的心理学本科生担任,并进行专门的调查培训,要求调研人员回本地本村调查。施测程序严格要求调研人员把量表带到农民家中调查。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民,由调研人员读给被试听,时间控制在1小时之内。较高受教育水平群体答题时间控制在40分钟之内。问卷当场发放,当场收回。最后,经过专业筛选,剔除无效问卷后建立数据库,运用SPSS16.0进行分析处理。统计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和差异分析等。

关于“农民城镇化意愿与响应能力的发展特征”的统计发现,会积极支持或响应国家城镇化建设的农民有1506人,占83.9%,不支持或不愿意城镇化的占16.1%。认为农村人口呈现不断向城镇转移趋势的有256人,占14.3%。城镇化建设的必要性方面,有58.1%的认为有必要,说不清占36.0%,6.0%的认为没必要。这说明,多数农民积极支持或响应国家城镇化建设,城镇化意愿度较高。

进一步调研发现,农民对城镇化建设的认知呈现“两栖化”:既充满期待又心存忧虑,尽管如此,农民实际上对城镇化建设的理想目标状态还是很清晰的,在他们看来,城镇化建设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乡村面貌的改变,更不是简单地增加几栋新楼房、修几条马路或是收入增加几百元,因为这些内容只是量变上的,而不属于质变。实际上,农民在充满矛盾的心理状态下还是显出对城镇化建设的清晰判断,具体而言就是,居住环境优美、生活设施齐全、文明素养提升、收入增加、邻里团结、服务完善、保障可靠。对他们来说,只有结构上出现质变,才意味着城镇化建设的预期目标已经达到。

三、农民城镇化意愿与响应能力的影响因素

调查发现,影响农民城镇化或到城镇居住生活愿意的正向因素中,排在前六位的分别是子女教育、自身发展、交通便利、提高个人生活质量、提高收入和城市各方面服务好。排在第一位的是子女教育。804人认为城市有优质的教育资源,其子女在城市就读能获得良好的教育,占总调查人数的

44.8%。其次是为了自身发展,占38.7%。再依次是城市交通便利(36.7%),能提高个人生活质量(32.4%),能提高个人收入(26.1%),城市各方面服务比较好(24.6%)。可见,农民城镇化的动力在于其自身及其子女的发展问题。

影响农民城镇化或到城镇居住生活愿意的负向因素中,城市消费水平高、生活成本增加、缺乏入城资金是影响农民选择的主要障碍因素(655人,占36.5%);其次是无能力解决住房问题(25.3%),就业太难、工作难找(22.9%),城市治安问题、污染较严重(13.9%),进入城市后难以享受基本的生活保障(11.2%),不适应城市生活方式(10.5%)等等。可见农民对城市生活的顾虑主要集中在生活方式、收入、住房及就业方面。

差异分析发现(表2),愿意与不愿意城镇化的农民在亲近分量表、依赖分量表、人际关系感、精神质和内外倾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其它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平均数的进一步比较发现,亲近分量表、人际关系感因子和内外倾特质方面,愿意城镇化的农民得分显著高于不愿意的;依赖分量表和精神质特质方面,不愿意城镇化的农民显著高于愿意的农民群体。这说明,愿意城镇化的农民,性格较外向,善于建立亲密关系,人际关系发展也较好。而不愿意城镇化的农民,较依赖别人,情绪不太稳定。因此,性格、情绪稳定性、人际关系、亲密关系和依赖关系等是影响农民城镇化意愿的心理因素。

表2 农民城镇化意愿的心理学因素的差异比较

	否	是	t
亲近分量表	3.071±0.550	3.221±0.556	-4.225***
依赖分量表	3.011±0.533	2.935±0.557	2.152*
焦虑分量表	2.883±0.719	2.866±0.754	0.352
亲近依赖复合维度	3.041±0.409	3.078±0.415	-1.395
人际关系感	3.288±0.647	3.440±0.651	-3.654***
确定控制感	3.104±0.541	3.141±0.617	-0.943
P量表(精神质)	4.603±2.175	3.808±2.053	5.983***
E量表(内外倾)	6.600±2.320	7.328±2.517	-4.567***
N量表(神经质)	5.690±2.650	5.489±2.738	1.150

访谈发现,农民进城后生活方式上的不适应,首先体现在农村与城镇在劳动生活方式、物质生活资料的消费方式以及精神生活方式等诸多差异,让进城进镇农民一时难以适应。其次,根据英格尔斯

关于现代化和现代化的人的理论：进入陌生的环境不戒备是其指标之一。^[12]但进城进镇农民不具备这样的心理素质，他们心中充满了不安全感，城镇对于他们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他们习惯于用费孝通所讲的“我看人看我”的观念来看待周围的人和事，对于原本住在城镇的邻居，进城农民会担心他们不接纳自己，“小瞧自己”，不敢不愿与其交往，而城镇居民因对农村居民的刻板印象也不愿与农民交往。这样一来，在生产生活的适应过程中，进城进镇农民处于夹心层之中。访谈中，几乎所有的中老年农民都表示出这种担心和忧虑。在他们看来，一旦离开曾经熟悉的乡村而来到即将裹挟于现代化潮流中的城镇，心理既向往又忧虑，担心自己难以适应城镇生活。

四、增强农民城镇化意愿与响应能力的对策

1. 积极推行社会保障制度

201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六城市的调研数据表明，进城农民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8.2%、29.8%、38.4%和11.3%，^[13-15]农民还被排斥在城镇低保以外。“生(存)有所靠、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基本要求与愿望，因而，应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使农民市民化，使其在城市有安全感和归属感。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和农村医疗保险三项制度建设是重点。首先，政府应该要求企业为农民“五险”买单，并将其纳入企业发展规划；其次是大力推行基本保障房建设，使进城农民居有定所；第三，建立健全关于农民土地赔偿的相关政策，让害怕失地的农民能够得到相适应的补偿，从而提高他们的城镇化意愿。

2. 改善进城农民子女教育现状

城市较好的教育条件、较强的师资力量^[16]是吸引农民进入城镇并定居的原因。但进城农民子女入学也面临诸多困难和问题。政府要切实采取强力措施，保证农民子女在城镇受教育的权力；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使农民子女享受公平教育的机会。政府应通过调整布局，优化教育资源，促进教育资源合理分配，使教育资源向农民子女倾向，让他们与城

市孩子共享资源；降低入学门槛，不因为户籍、教育经费等问题限制农民子女入学。只有改善农民子女教育条件，促进教育资源合理分配，提高教育质量，保障农民子女得到良好的教育，城镇化建设才能得到农民拥护。

3. 丰富重视进城农民业余文化生活

文化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文化建设，不仅能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而且可以使广大农民在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生活中，受到美的熏陶、思想的启迪和心灵的净化，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因而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必然能促进其生活质量水平的提高，使其尽早融入城镇。政府应加强城市文化娱乐设施建设，同时为进城农民提供丰富多彩的娱乐方式。文化活动的內容必须反映有利于城镇化进程改革和发展的思想，反映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精神，鼓励人们艰苦创业，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因而，要在正确把握文化活动内容的基础上，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要继续发扬优秀的乡土文化传统，营造农民自己的精神家园。乡土文化虽然有其落后性(如封闭性、特殊性、私利性)，但是就其维护团结、促进整合、给人精神依赖等方面，仍具有重要的价值。乡土观念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核心。一方面，具有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人们可以相互获得物质与精神上的支持，保持生活的平衡；另一方面它又为人们提供明确的行为规范，有利于社会的整合。并且乡土观念里的尊老爱幼、注重人际关系、注重婚姻家庭关系等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这些观念是中华民族高尚道德的体现，在现代社会应该坚持并发扬光大。这些观念也是“人本主义”精神的体现，是与提高人的生活质量的要求相一致的。现代社会，人们日益孤立、紧张、焦躁，产生精神上的不适，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强调乡土观念的积极作用。^[17]

4. 提高进城农民心理健康水平

新生代农民思想活跃，向往城市生活，生活期望值和欲求都高，但是就业流动性强，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危险性高，生产条件恶劣，居住条件差，又不被城里人认可。因此，这些来自工作、经

济和社会的压力很可能使他们感到受挫和焦虑,对生活前景感到失望,产生不确定感和不安全感,内心心理定位认同自己的城市“边缘人”状态;^[18]对所在企业的认同度、安全感低,缺乏归属感心理。抗压能力差的年轻人可能自暴自弃,甚至迁怒他人,危害社会。因此,一方面,加大教育培训力度,让农民能够认识心理学、接受心理学,对心理学及自身的心理状况有所了解;另一方面,积极组织心理学学者加紧对农民心理问题及其对策的研究,并运用于实际之中,组织心理学相关人员深入农民社区为他们解决心理困惑。此外,全社会尤其是城镇居民应该学会尊重农民,拒绝歧视,而给予农民以更多的心理关爱和精神扶助;同时,心理学专业人员应该引导农民对物质和精神方面建立合理预期和积极体验,避免产生过多的心理落差,引导农民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保持开朗、自信、友爱的心态,使农民能够产生安全感与安全型依恋。

总之,应通过系列化的工作以及各方面的配合,清除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各种障碍,消除农民对城镇化的担忧,按照农民意愿努力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向中心城镇转移,从而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

参考文献:

- [1] 黄学贤,陈峰.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路径探析[J].学习论坛,2010,26(9):68-74.
- [2] 刘超,朱满德.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基本权益保障问题调查——以贵阳市花溪区为例[J].广西农业科学,2010,41(7):736-738.
- [3] 廖松.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J].商场现代化,2010(19):163.
- [4] 李二玲,刘萍.欠发达农区农户对城市化的响应能力分析——基于对河南省1251户农户的调查[J].中国农村观察,2010(2):34-44.
- [5] 鲁建彪.西部地区城镇化建设与西部农民收入问题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06(7):63.
- [6] 吴秀敏,林坚,刘万利.城市化进程中西部地区农户的迁移意愿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5(4):27-33.
- [7] 竺云.南京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意愿调查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3.
- [8] 蒋乃华,封进.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意愿考察——对江苏的实证分析[J].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02(2):24-29.
- [9] 戴晓阳.常用心理评估量表手册[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0:174-180.
- [10] 钱铭怡,武国城,朱荣春,等.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的修订[J].心理学报,2000,32(3):317-323.
- [11] 陈仲庚.艾森克人格问卷项目分析[J].心理学报,1983(2):211-217.
- [12] 杨叶忠.农民的城镇化意愿及其主体参与机制建构:苏浙沪调查[J].重庆社会科学,2012(2):26-31.
- [13] 余戎,罗清萍.以农民为本稳步快速推进城镇化[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8-11.
- [14] 班永飞.新农村背景下中国农民生活质量现状研究——以云南、河南为例[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09.
- [15] 胡央娣.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影响因素研究[J].统计研究,2009(4):105-108.
- [16] 班永飞,李辉.中国农民生活质量的比较研究——基于云南、河南的调研[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4):45-50.
- [17] 吴绍琪,陈千.高级知识女性群体主观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初探[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5,17(4):56-59.
- [18] 朱启臻,袁明宝.“被城市化”的农民生存透视[J].人民论坛,2011(23):18-20.

责任编辑:陈向科